

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 农业贷款工作及实效分析*

范连生

资金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本的效果,在结合自然与人工而为生产的媒介,农民的成功与失败,与资本的多寡大有关系。因无资本则虽有肥沃的土地,亦不能充分利用以增加生产改良品质,且有时不得不受商人的剥夺,不能雇佣人工来帮助生产。”^[1]因此,拥有必要的资金,是进行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解放前,由于农业生产衰退、农产品价格低落、战事频仍、天灾横行之累,加之各种剥削日益加重,农民财力耗尽,资金短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举债,而且借债主要并非用于生产,而是困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承负重债。新中国成立初期,黔东南地区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反封建运动后,农民生产情绪极为高涨,因而大力发展生产已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人民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农业贷款,这就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对当时“三农”问题的初步解决发挥了积极效用。下分两个阶段评述建国初期(1949—1956)黔东南地区的农业贷款工作及其实效。

一、土地改革时期的农业贷款(1949—1952)

全国解放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发展生产,就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中心任务。为了实现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为了解决贫雇农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黔东南地区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土地改革前后,该地农业贷款以实物为主,主要有:农具、耕牛、种子、肥料等。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放贷款,主要目的是通过贷款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整理和兴修小型水利,有重点地帮助土地加工,同时适当地解决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

1950年8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农林厅转发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颁布的《西南区一九五〇年农业贷款贷放原则》,该原则对贷款的用途、对象、方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贷款用途:为使贷款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对于贷款的用途,应严格限制于贷放生产资料,不贷给生活资料,其具体用途的分配,主要的应运用于对粮棉生产确实有效的事业,如肥料贷款、农具贷款、耕牛贷款及病虫药剂贷款等,各地并可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酌量分配一部分贷款于蚕桑麻类和甘蔗等特产的增产。贷款对象:以农户主要的是贫农,其次是中农,作为贷款的对象,对于贷款的分配,应掌握贷放的基本原则,通过农民协会、农协小组等农民团体的民主评议和地方政府核准确定之,使贷款可以给予真正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中农。对确有困难的中农适当给予贷款,对地主富农一律不得贷款。贷款方式:第一、有重点的选定贷款的地区和对象,贷款要根据借款人生产

范连生,男,史学博士,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建国初期西南地方政府民族政策的灵活运用与西南社会稳定研究”(项目编号:11BMZ006)。

的需要,能帮助一户是一户,反对平均主义,务使此次贷款绝对用于生产资料的补充,保证生产的提高和贷款的如期收回,对于农民依靠贷款的心理和浪费贷款的事情,必须予以适当的纠正制止。第二、原则上要尽量采取实物贷款,不能采用实物的贷款,可以直接贷放稻谷,用以购买生产资料。第三、贷放的生产资料,分为肥料、农具、耕牛和药剂四种,其购办的方式可依据实际情形,分别由个人购买和集体购买,但集体购买或定货原则上应将核准贷款的农民加以组织后,由区人民政府指导办理,并尽可能通过贸易机构购办之,个人购买则乡村干部应掌握政策,机动的协助农民购办,务使贷款确实可以购得必需的生产资料。第四、各种贷款由各级农业机关指导市县以下区村地方人民政府直接办理。在贷款手续上,经过民主评议后,由村长或农协主席介绍到银行营业所办理借款手续,或由银行常驻乡镇的工作人员携款到村发放。事后进行贷款用途检查,保证贷款专款专用。^[2]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黔东南地区各县大力贯彻省农林厅的指示,对农户积极贷款,扶持农业生产。1950年黄平县人民银行首次对新州区老鸹屯23户农民贷放大米5.18吨,折合人民币207.2万元(旧人民币,下同),到期以大米和折收烤烟、桐油及五倍子还款。^[3]随着全区减租、退押及土地改革运动的迅速开展,各县人民银行组织流动服务组深入农村发放贷款,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在及时供给和调剂农业资金、组织农村副业生产等方面,发放了大批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购买耕畜、农具、种籽、肥料,并帮助农民养猪喂羊,另外,贷款还帮助农民防旱救灾,及时进行秋收以及扩大秋耕、秋种面积等,解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从1951年5月起,人民银行榕江支行就有计划地结合反封建斗争以及抗美援朝运动等中心工作发放农业生产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先后在三区的寨蒿、四区的平靖两地建立了发放农业生产贷款的机构,并组织了两个流动服务组。该行工作人员进行发放农业生产贷款时,配合区、乡人民政府,以村为单位,结合各自自然村的具体情况,通过农民协会,先后召开了村干部以及各种群众性的代表会议,充分宣传抗美援朝、增产爱国的道理,使农民进一步认识爱国增产的意义,然后反复交代了贷款政策、方针以及“专款专用”原则,采取了“自己需要、自报公议”的方式,由小组充分酝酿讨论,再由下而上地进行反复的民主评议,慎重合理地确定贷款额与贷款户数,当众放款。根据11月底统计:共发放农业生产贷款289390000元。其中有农具贷款127930000元;耕畜及副业贷款158950000元;种籽贷款2410000元。农民得到贷款后,纷纷添置农具与耕牛。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购置各种农具2800余件,购买耕牛60余头。^[4]因此,通过贷放农业生产专款,确使部分农民解决了耕畜、肥料、农具、种籽的困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由于部分干部对政策方针了解不够和业务生疏,工作不够深入细致,银行下乡办理农贷人员与区乡干部结合不够密切,在农贷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第一、违背专款专用。第二、平均分配,未掌握重点贷放原则。在贷放中,没有根据农民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确定贷额,存在着“普降小雨”的平均思想,致使贷款到农民手中不能及时投向生产。第三、随意挪用贷款,延误时日,个别地区的贷款小组长或同组户户,乘机挪用贷款。第四、多余款不退还银行,用到生活上去了。农民借到款后,除了正当用途外,剩余款未送还银行。

1952年,为确保农贷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贷款效用,省政府农林厅、中国人民银行贵州分行联合发出指示:重申贷款对象以村、供销社及其小组为单位,并应以贫雇农为主,适当照顾中农;贷放时以银行为主,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流动贷放小组,强调反对平均分配普降小雨的贷放,并要对少数民族地区及灾区应予特别照顾。^[5]如中国人民银行丹寨县支行在1952年第二季度农贷中纠正了过去农民把贷款移作他用甚至浪费贷款的现象,贷款时先与县农林科和合作社取得密切配合,贷放实物,保证了专款专用,使贷款切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实物贷放中,银行还简化了贷款手续,采用了不贷现金而发农民拨物证的办法。农民只持拨物证便可直接到合作社领到他需要的实物。如果合作社暂时缺货,则可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讨论出应贷户的应贷实物和共贷款数,由村庄和农民协会主席负责领出,银行只作暂记。直到农民用贷款买到东西后,再拿发货单和税票到银行入账。^[6]由于一些地区缺乏长期扶持贫雇农观点,农贷只贷给中农,不贷给贫雇农,怕他们还不起,在自由借贷上亦未深入宣传政策,及时纠正偏向,因此,1952年省人民银行对布置本年度第四季度农贷再次提出注意事项:强调贷款用途分牲畜、农具、肥料贷款。为了通过贷款,促进农民组织起来,各地应对互助组优先贷款。另外必须坚决贯彻以贫雇农为主,并适当照顾中农的阶级路线。过去有些地区贷给中农的占50%以上,甚至贷给富农、地主及小土地出租者,这都必须予以纠正。^[7]

这一时期,在农贷政策上,省、专各级银行机构还采取了一些颇为灵活的政策措施。如为了支持烈军属及还乡

军人的生产,1952年7月8日,镇远专署人民银行函告各县支行,对灾区军、工、烈属及还乡生产军人的贷款,按原放利率减10%的优待。再如为了能及时地把贷款用于农业生产,1952年10月10日,省农林厅通知,把1953年度的农贷款提前发放一部分,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根据各地反映,每当春耕季节,农民急需耕牛,届时发放耕牛贷款,难以满足农民需要,并且争相购买,造成供不应求,刺激牛价上涨及增加农民负担等情况,如能提前于第四季度发放一部分,不但可以纠正此种偏向,且秋收后饲料方便,此时买牛犊饲养,来春长大,亦可使用。为适应此种需要并解决秋耕秋种的困难,省农林厅经请示后,将1953年贷款提前发放一部分,便利农民添购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8]

土地改革后,黔东南地区许多贫雇农缺乏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人民政府进行的农业贷款,可谓雪中送炭,及时解决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这就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合作化时期的农业贷款(1953—1956)

这一时期的贷款对象、类型与前一时期相较,有了明显的变化。合作化后,农业贷款重点是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此解决部分农户入社缴纳资金的困难。1953年7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强调:农业贷款,必须按照各地生产季节及时发放,必须贷给生产及生活上有困难而要求贷款的农民,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之间必须作合理的分配。参加互助合作的,是雇农、贫农和中农,为了改进生产设备,他们较之个体农民需要较多的贷款,因而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比较多的帮助,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如果照顾过多,贷款过多,因而不给或少给个体农民贷款,则是不对的。对一个合作社、一个互助组的贷款,对一户农民的贷款,也应根据地区的贫富、农民收入的多寡及贷款用途的不同,在数额上加以限制,原则上以不超过其一年总收入的10%或20%为宜。^[9]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省合作专业管理处、人民银行贵州分行、省农林厅联合指示:1953年农业贷款,按用途分四类:第一、农业生产放款,包括农具、病虫害、种籽、牲畜饲料及其他生产放款等。期限一年以下,利率月息一分。第二、设备放款包括新式农具、病虫害防治器械、特产加工设备及耕畜、种畜、小型水利、育苗、造林、其他设备等。期限三年以下,一年能还者,可订一年,不应机械定为三年,并可分期归还,利息为月息七厘五毫。第三、农村周转放款包括农村副业、农村手工业、农村生活(包括口粮)等。第四、合作周转放款,系指信用合作社放款,利率按月息二分厘。对供销合作社基层社贷款,应按贷管单位办理,不在农贷范围以内。^[10]

针对农民面临的实际困难,从江县尽力地及时地进行了各种农具贷款,发放了救济粮和冬季寒衣,到1953年4月,8个月中,人民政府共贷出各种农贷款765659450元,其中农具贷款253530256元;耕牛贷款177632992元;副业贷款45445295元;水利贷款49230902元;种子贷款1071924元;农村工商业贷款78862924元;生活贷款9185456元;其他43642589元,另外发放救济粮70500斤,救济款33492000元,冬季寒衣1490套。^[11]这些贷款适时地解决了贫雇农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困难,有力的支持了生产。1953年,镇远县涌溪乡第五村共贷款21106500元,其中设备性贷款占38%,农业生产占15.6%,一般性贷款占46.4%,另有无息贷谷2234斤,救济米1000斤,人民币250000元。贫雇农共75户,给贷的70户,贷到16692500元,每户平均238464元。中农共39户,贷款的30户,贷到4414000元,每户平均低于贫雇农91334元。这种实际的帮助,是完全适合他们的需要,从而使农民“休养生息”,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农户在生产上的某些困难。^[12]

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村地区连年获得丰收,但一般说来农民的家底仍然是薄的,尤其春季是农业投资最多最集中的季节,加上农民觉悟的提高及生产情绪的高涨,因而其生产投资就会比往年更多。就是说,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涨,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设备,扩大再生产,需要增加资金,而农村中部分贫困农民及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瘠山区的农民,生产和生活上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这些困难的解决,除发展互助合作及农民之间互通有无外,就需要国家各项经济工作的有力支持,农业贷款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项目之一。1954年,政务院指出:各地必须做好农业贷款工作,并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吸收农村游资,用以发展农村生产,促进互助合作,并加强与高利贷资本作斗争。同时,通过农业贷款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放款,帮助有困难的农民及时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免误春耕生产。^[13]

1954年2月26日,《新黔日报》发表题为《大力支持春耕生产,积极发放农贷,办好信用合作》的社论,指出:在贷款对象上,由于解放三年来,农村经济变化甚大,很多贫雇农已上升到中农水平,中农实际上在农村中已占多数,它是互助合作的基本成员,应是贷款的对象。根据这一政策,在贷款上就应以刚上升的贫农和新升的中农为贷款的对象,予以积极扶持,帮助其解决困难和摆脱高利贷的剥削,从各方面关心他们,使他们同其他农民一样,获得发展和改善生活的机会;同样的,对生产生活上有困难的中农,仍应给予适当的贷款帮助。不顾及到中农的需要,不给予必要的贷款,也是不对的。还有一部分贫农,由于家底薄,生产与生活上困难仍然很大,为了使其避免高利贷剥削,更好地发展生产,也必须加以积极扶助。这样才能达到有助于农业生产,有助于贫困农民经济生活的逐步改善,有助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贷款的用途上,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逐步帮助扩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对常年互助组,可根据需要与自愿及对生产有利的原则,适当提倡积累公共财产,增加设备,但应防止盲目扩大公共财产,影响生产情绪;对于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仍应以解决一般性生产需要和生活困难为主。^[14]

为了做好1954年的农业贷款工作,各级银行有针对性地克服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过去对小农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从而产生了不顾及小农经济特点的急躁冒进情绪,在贷款期限上“从短不从长”,强调“专款专用”、“保借保还”、“不组织起来不贷款”等错误做法;但从1953年批判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后,又放松了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的积极扶持,强调了适当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忽略了对小农经济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满足农民眼前利益这一方面着眼得多,从国家利益与农民长远利益考虑的少,又产生了“贷款要多”、“收贷要少”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因此,要正确执行贷款中应积极扶持互助合作的发展、又要适当照顾个体农民需要的原则,正确地把握好这个“度”。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扶持并贷给较单干农民较多的贷款是合理的必要的。1955年,炉山县银行对互助组、农业社发放农贷54000元,生产费用贷款一年期,利率9厘。当年互助组、农业社利用贷款购买耕牛582头、新式农具27部、肥料78000公斤、烤烟苗448000株和各种小农具3357件以及口粮75000公斤。1956年,银行又发放生产、生活贷款5.09万元,帮助2484户贫困户和受灾户购置生产、生活资料,利率月息7.5‰。^[15]

合作化时期,黔东南各地还成立了一些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将吸收农村游资、组织调剂农村资金、帮助农民和合作经济组织解决资金困难、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和开展多种经营作为信用机构的主要任务。一般说来,由于信用社资金薄弱,灾区口粮贷款及极贫困户贷款仍由银行解决。

这一时期农业贷款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主要有:第一、实物供应问题。一般反映较普遍较严重的问题是耕牛的供不应求,在耕牛较缺的地区当然问题更大,但有的是因为群众需要大的、好的、而不愿意买小的、不好的、价钱高的,也形成人为的紧张。根据天柱三区蓝田五村的抽查,28%左右的贷款还存在农民手中未买到东西,锦屏三区的部分农民,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把贷款退回银行,这些对农贷的投放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干部在思想上,由于对春耕生产的紧张情况认识不足,有的干部有单纯的任务观点,不问效果、盲目滥放。锦屏二区耕牛要70元就可买到而干部贷了100元,有的又卡得过紧,怕将来难收,麻烦,甚至有的以实物供应不足作藉口不发放,施秉的部分干部发放耕牛贷款非得叫群众先买到耕牛才贷放。第三、个别地区的银行干部,固定在自然村里搞生产合作社,而没有流动发放农贷的机会,使贷款不能及时贷到农民手里,同时还存在着贷款多集中于干部常到的中心地区而边沿区的贷款少的现象。^[16]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和错误,1955年4月,专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作好农具供应及贷款工作,各县联社应密切配合农林部门共同研究,作好生产防旱抗旱工具的充分准备和种子耕牛的供应,而且要做到质量好、规格合、价格合理,使农民满意。鉴于部分地区向银行贷款后,存放在手中未买到东西,或者需款贷不到等现象,各级银行必须积极贯彻“边贷边检查”的方针,以免贷款不当的现象发生。^[17]之后,各县积极贯彻专署的指示精神,对贷款的对象、用途、额度等边贷边检查,大大地减少了贷款中的混乱现象,使农业贷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为合作化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建国初期,黔东南地区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对少数民族,根据生产自救的原则,给予了大力的帮助。虽然在贷款中有缺点和偏差,但总的说来,在农贷方面,银行将农业贷款列为中心任务重点办理,其贷款额度逐

年上升,特别是在合作化运动后期,更是加大贷款额度。这些农贷的具体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使农具、牲口、肥料、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增加,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高了农业产量。二是促进了一些地区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农民获利增多,农民收入有所上升,因此农业贷款对建国初期黔东南地区“三农”问题的初步解决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言心哲.农村社会学概论[M].上海:中华书局,1934:353.
- [2]西南区一九五〇年农业贷款贷放原则[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73—目录号1—案卷号2.
- [3]黄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平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412.
- [4]人民银行榕江支行农业贷款工作获得成绩与经验[N].新黔日报,1951-12-20(2).
- [5]贵州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联合指示:为布置五二年第一季度农业生产贷款配额并指示注意事项数点希治照办理由1952年3月[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50.
- [6]丹寨县人民银行支行通过合作社发放实物农贷[N].新黔日报,1952-7-4(2).
- [7]1952年省人民银行通知为布置本年度第四季度农贷提出注意事项[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50.
- [8]省农林厅通知:为通知1953年贷款提前贷放一部以应农民需要由[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50.
- [9]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1953年7月9日[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72.
- [10]省合作专业管理处、人民银行贵州分行、省农林厅(联合指示)事由:为布置1953年第一季度各种农贷款额度希遵照由[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72.
- [11]梁旺贵副县长在从江县第四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53年4月[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45—1—121.
- [12]中共镇远地委会:镇远县涌溪乡第五村发放农贷工作的检查1953年10月11日[Z].黔东南州档案馆: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地委文件(合订本).
- [1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1954年3月18日[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106.
- [14]大力支持春耕生产积极发放农贷办好信用合作[N].新黔日报,1954-2-26(1).
- [15]凯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凯里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923、924.
- [16]人民银行镇远中心支行:春耕生产中的农业贷款工作简单情况1955年4月18日[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155.
- [17]镇远专署:关于加强防灾和春荒救济工作的紧急通知1955年4月30日[Z].黔东南州档案馆馆藏档案:73—1—155.

责任编辑:王建平